

将“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置为一级学科，既是全党的大事，也是学界的盛事。回望学科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相关研究便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积淀，孕育出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建设也随着党的伟大事业展开，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是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对深刻总结百年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形成全方位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格局，发挥党史党建学科资政育人的功能，激活大党行稳致远的“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发展密码，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历史时刻，要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在大融合中建设好、运用好、发展好中共党史党建学科。

以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推动人才培养大融合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既是加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切实需要，也是新时代为党和国家培养党史党建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其一，将理论指引与实践指导相融合。毛泽东曾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党史党建理论和实践知识的融合发展，是培养高质量党史党建专门人才的必由之路。其二，将党史教育与党的建设相融合，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学生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推进学科融合发展。其三，将传承基因与赓续血脉相融合。党的历史是党性教育最生动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培养党史党建人才，要坚持不懈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学习中



□ 成旦红

传承红色基因，在行动中赓续红色血脉，在思想上争做红色传人。其四，将使命意识与家国情怀相融合。培养党史党建人才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保持清醒和坚定的使命意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扰，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以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导向,推动研究领域大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为深入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指引。开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建构，首先，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大党史和大党建的角度看待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找准学科融合的研究切入点和学术增长点，科学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等问题。其次，要以原有的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为“枝干”，以相关学科群为“树叶”，统筹推进学科融合建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的消解，而是在大融合中共促共生、同向并行，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主干内容。第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历史和政党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在中西方比较当中认清作为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更要坚信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充分体现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将研究领域大融合服务于自主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需要。

以开放系统性和有机结构化整合为原则,推动学科方向大融合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学科方向的合理设置是学科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石。一个学科能否发展好，最基础、最关键的是要凝练好学科方向。过往党史和党建研究相对独立，党史学科重历史和人物研究，

缺少理论支撑；党建学科重实践和现实问题、缺少历史底蕴。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是党史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长期积累，是学界不懈努力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党史和党建在学科性质、作用功能和时代价值等方面都有相似和共通之处，需要以开放系统性整合和有机结构化为原则，推进学科方向融合发展。

以政治思想素养过硬为标准,推动师资力量大融合

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大融合发展，关键在教师。要以政治素养过硬为选聘标准，坚持“铁铁必须自身硬”，推动师资力量大融合。其一，注重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和内外品格。中共党史党建专业的教师，不论侧重党建还是党史，都必须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其二，逐渐调整和扩大党史党建专业教师队伍。一方面，目前很多单位已经设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要大力引进和培养具有党史党建研究复合型科研能力的新鲜师资力量，尽快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在立足党史党建学科特色的同时，广泛吸纳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行政学等方面的教师，开启多学科交叉大融合的局面。其三，打通校内和校外党史党建师资平台。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初期，高校不仅可综合聘请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相关优势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谋学科发展，而且可聘请校外高校、党校、干部学院等相关专家学者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建设助力。其四，充分发挥好学术研讨会的交流平台作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初创时期，很多问题还需要长期探索，利用好学术研讨会等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建设经验互通互学、互鉴互融。

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为指引,推动研究方法大融合

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的必经之路。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为指引，一要坚

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融合统一。虽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做学术、搞研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在史料挖掘上下功夫、在理论建设上找问题。二要坚持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融合统一。开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理论本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牢固树立和运用正确历史观、党史观。三要坚持独具一格与兼容并包融合统一。既要坚持党史和党建学科各自的研究方法论，也要自觉推进学科总体研究范式的形成，贯通历史与现实，提炼经验与规律，使党史和党建学科研究由各自为政逐步走向融合发展之路，力求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四要坚持学术研究与成果外宣融合统一。做好党史党建学的发展建设工作，在构建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构建外，还要坚持将研究成果积极进行宣传转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贯彻并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要坚持本土化发展与国际化交流融合统一。促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特色发展，既要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本土化的实际，让学科更具有本国特色，建立起自主的知识体系、研究体系和方法体系，也要吸收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研究理论和方法。

总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大融合中实现在人才培养、研究领域、学科方向、师资建设、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大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系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程颢书院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古书院社区，亦称“古书院”，由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任泽州府晋城县令时创办，程颢、程颐两兄弟都曾在此讲学。作为程颢创办的第一所书院，程颢书院在中国理学发展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国内诸多学者视作中国理学之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纵队曾在此驻扎休整，古书院墙上留下的标语和壁画是见证那段光辉历史的红色印记。

首开晋城崇文重儒先河

晋城史称“河东屏翰”“三晋门户”“太行首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宋五代时，晋城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占据。因长期战乱影响，直到北宋，此地教育仍很发达，尽管有不少学子参加科举考试，但中举者却寥寥无几。山西落后的教育现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选派一位能够扭转当地政风学风的优秀官员，成为当务之急。北宋治平年间，程颢由上元县主簿调任泽州府晋城县令，太行山上的晋城县由此与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程颢和弟弟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二程”的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所亲撰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遗书》《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书》。他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历任鄆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程颢来到晋城任职，下决心将这片多年战乱之地治理好。他生活简朴，同情百姓疾苦，工作兢兢业业，在发展经济、维持治安、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其最为突出的政绩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为改变晋城重武轻文、文化发展长期落后的局面，程颢制定了“欲治晋先兴文”的从政纲



要，提出了“乡必有校”的具体举措。在程颢的大力推动下，晋城建起72所乡校、数十所社学，办学数量和力度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程颢书院作为晋城有史以来第一所“官办”书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由于晋城长期以来社会动乱，流寇四起，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建立书院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程颢打破官场陈规，动用了所有能用于修建的资金，他倾其所有积蓄，捐出传家之宝——孤本《尚书》，还将夫人彭氏的首饰妆奁全部变卖，以致夫人病重竟无钱医治。程颢此举感动了晋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助学兴教。此外程颢还想尽办法开源节流，置学田三百余亩，解决必要的日常开支。最终建成了这所日后影响深远的书院——程颢书院。

“程朱理学”的发源地

程颢亲自担任书院山长，书院既是学子学习和学者讲学的场所，也是程颢作为县令办公的地方。他白天是县令，处理县衙繁杂的事务；晚上是山长，除具体制定学规章制度、教学宗旨、教学方法及培养目标外，还常常亲自登台讲课。书院无论在教育方式



还是教学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书院坚持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既是程颢讲授理学的学校，也是“程氏理学”的研究中心；坚持文化学习与道德培养相结合，适应当地需要，自主设置课程，比如置办学田供学员闲暇之时僮耕识禾，设置武科教授武艺；推行讲会制度，开创儒学课程新体系，制定师生共鉴的《四箴有序》学规。与当时大多数书院不同，程颢书院的教学方式更为开放包容，不限定入学条件，向一切求学者开放。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

程颢书院对晋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民风为之一变，人人读书，家家向善，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景象。黄庭坚的叔父黄廉到晋城考察，赞誉道：“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明朝学者张璠在《重修程子祠记》中说：宋代“熙宁、元丰间，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人，达乎邻国高平，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是已。”如北宋的宋太初，仕至权御史中丞；刘羲叟，仕至崇文院检讨；王献可，仕至泸州知州、英州刺史；王云，仕至资政殿学士；段思恭，仕至镇国将军，节度使。元至明、清，泽州5县涌现出来的人才更是多如繁星，清代



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纂纂陈廷敬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程朱理学”的传播与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程颢书院作为“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所建最早讲学之所，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是程颢、程颐办学讲学生涯的起点，其后“二程”主要讲学于洛阳周边的程氏书院、伊皋书院、大程书院、春风书院、嵩阳书院、龙门书院等。“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时先后拜师程颢、程颐，并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杨时于公元1111年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传播理学。朱熹作为杨时的三传弟子，继承程氏理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他曾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名声赫赫的书院讲学。因此，梳理“二程”到杨时再到朱熹的师承关系和他们办学讲学历程可知，程颢书院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发源地。

太岳纵队曾在此驻扎休整

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程颢书院在创建60年后遭遇第一次劫难。元泰定年间，郡守建明道先生祠堂。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泽州知州王所用在书院原址重建文昌书院。文昌书院的修建，使得晋

城的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程颢创办的书院在沉寂百年之后，迎来了它的又一次辉煌。清光绪初年，书院更名为“明道书院”。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明道书院变更为书院小学。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程颢书院先后成为牺盟会晋城分会、决死三纵队晋城独立第三营驻地，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行纵队曾在此驻扎休整。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成立，改组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1937年7月成立的牺盟会晋城中心区曾在古书院枣院院驻扎。决死三纵队独立第三营的前身是晋城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之后被编入晋豫边游击支队。1946年末，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4纵队第13旅4大队第2营进驻古书院村休整。休整期间，部队对新兵进行了政治学习及军事技术培训，经过4—5个月的整编，补充兵力达500余人。部队于1947年4月初开赴晋南，随后参加了解放曲沃、运城、临汾的战役。太岳纵队在古书院住址几所四合院墙上留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宣传标语和以攻城、练兵为题材的壁画是见证那段光辉历史的红色印记。

2007年，程颢书院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为了重现书院历史风貌，重塑晋城文化地标，程颢书院修缮重建方案初步确定。2013年书院修缮工程开始动工。到2014年10月份，一期修缮工程完工。2016年3月，程颢书院修缮保护二期古建筑文物修缮工程开始启动。2017年底恢复全部四个院落，并建立程颢书院保护区、程颢书院博物馆、先师祠、藏书阁等。历经950多年岁月沉浮，程颢书院在新时代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双重地标”。

